

第十六辑

汕头文史

史

SHAN TOU
WEN SH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汕头市委员会
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编

第十六辑

江湖之
丈

目 录

回眸：一九七九·中国特区

- 原广东省委书记兼深圳市第一任
市委书记、市长吴南生访谈录 杨 剑(1)
- 注重效益 稳步发展
- 汕头经济特区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 刘 峰(11)
- 汕头经济特区十年历程 吴 波(19)
- 汕头经济特区创办头十年精神文明
建设回顾 陈序藩(32)
- 辉煌人生路 精忠报国情
- 李嘉诚先生在 1978 - 1998 年
..... 陈衍俊(42)
- 丹心系桑梓 青史留芳名
- 记林百欣先生暨夫人林余宝珠女士
..... 袁伟强(63)

EA35/30

汕头市全面落实市区城镇侨房

- 政策纪实 王炎荣(72)
- 和平重建时期的金边城潮人和
柬埔寨潮州会馆 陈景明(79)
- 汕头人民支援北伐战争纪事 秦梓高(85)
- 近代外国驻汕头领事馆及领事考
..... 房建昌(89)
- 从夏衍追忆南强书局的一封信谈起
..... 陈梦熊(109)
- 汕头港引航话旧 沈饶生(118)
- 汕头的天主教区和外来基督教
新教述略 房建昌(124)
- 1945 年以前日本人在汕头情况记述
..... 房建昌(130)
- 记汕头解放前夕的策反工作 秦梓高(168)
- 试谈民国时期普宁货币的沿变 黄振坤(173)
- 征集汕头岩石风景区摩崖石刻
墨宝纪实 刘麒子(184)
- 先父姚华萼生平追忆 姚祥智(191)
- 吴颖传略 尔 迟(209)

回眸：一九七九，中国特区

——原广东省委书记兼深圳市
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吴南生访谈录

杨 剑

吴南生，1922年8月生于汕头市，1936年参加革命，1944年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9年随军南下，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1979年负责筹办广东省3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同时兼任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1985年起任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

最近，吴老在汕头、广州等地就广东的改革开放、广东经济特区的创立等问题，与记者进行了多次交谈。

中国，从人民站起来的那天起，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春秋。当又一次变革席卷华夏大地，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被派往深圳特区兼第一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历史的选择，让他站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在实践邓小平理论的特区舞台上，他色彩纷呈地演绎了自己投身革命、从政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回眸历史，一个拓荒者在没有路时的跋涉，每一个脚印，都有着其非同寻常的价值与意义。

记者：1979年春天，国家刚刚摆脱“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精神

枷锁刚刚解除，人们在欢呼雀跃的同时，也感受着茫然无措——百业待兴，困难重重。人们憧憬着，期待着，却又不知从何着手。在一个新的时代即将起步的时候，您是如何在广东省汕头那座小城酝酿、提出并筹办中国经济特区的呢？

吴南生：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说办成这个特区，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做出了开放改革的决定。没有这个决定，一切无从谈起。地利嘛，应该说，广东总是得风气之先。你看，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到孙中山和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都是从广东开始的，这得益于一种地缘优势。特别是广东毗邻港澳。从办特区来说，深圳、珠海这样的地理环境太好了。人和嘛，我想是各方面的：港澳同胞多、华侨多，特别要强调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共产党的内部、我们国内广大干部群众，都迫切地希望改革。因为我们搞了多少年的那套穷社会主义，大家实在是受不了了！

受不了还不好讲，因为你不知道社会主义是怎么搞的，以为社会主义就是搞阶级斗争，搞计划经济。

十年浩劫，让大家都觉悟起来，觉得我们这个国家不改革不开放就不行！每一个人脑子都要想一想了，一个国家为什么搞到这么穷，搞到这么绝对化！我想，三中全会、小平同志他掌握住了这个脉搏，尽管还有很多不同的思想，总的说是要改要变。海外的许多爱国同胞、包括港澳同胞，也期待着我们能拨乱反正。

所以我说，没有这个条件，特区是办不成的。

具体地说来，就是1979年年初，省委分工我到汕头去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那里前后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汕头是我的家乡，是一个开放比较早的城市，五口通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不知怎么搞的，连恩格斯的著作里都写着：“其它的口岸差不

多都没有进行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 5 个开放的口岸。”汕头在解放初期，还是个商业很繁荣的地方，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 年过去了，特别是经过“文革”，眼前的这座城市真是满目凄凉，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都还穷呵！我当时很气愤，我说谁要拍电影，要反映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你就到汕头来，拿汕头做一个背景。

……那段日子睡不好觉，闭上眼睛就想：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这样一幅江山啊！

我当初的想法，和大家一样，觉得非变不可。不同的是我和海外的联系比较多，知道外边的情况多一点。那时，叶帅在广东住，他对广东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他跟我讲，南生呵，我们的家乡很穷呵，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要多想办法！这些对我们都是很大的启发。我问过许多人有什么办法没有？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他一说，我恍然大悟。所以我最初提的意见，就是划出一定的地方，减税收，简化手续，彻底开放。就是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框，把市场经济引进来。

1979 年 2 月 21 日夜里，我当时正感冒发烧，可是心情很激动，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并省委。2 月 28 日下午，我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我家中和我交换了意见。3 月 3 日，省委开常委会议，我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说，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懂得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先掌握主动权。要贯彻三中全会的决定，我主张广东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的那个“子”怎么下呢？我想先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引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当时我提议可以考虑设在汕头。汕头在全省来说，除了广州外，它是外贸最多的地方。第二，汕头的华侨是全国最多的，在外面有很多有影响的人，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如果万一办不成，那也影响不大，它偏于一隅嘛。我说如果省委同意，我去办。我的意思，要杀头就杀我啦。一说，大家都赞成。我们省委在开放这一点上，总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习仲勋同志就说，要搞，全省都搞。4月份中央开工作会议，赶快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

但是，这个地方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叫“出口加工区”，和台湾一样，那就糟糕了；叫“自由贸易区”，就好像资本主义摆在脸上了；叫做“工业贸易区”吧，又不像……好几个名字摆弄来摆弄去的。当时，叶帅在广东，我和仲勋同志去向他汇报，叶帅很高兴，说：好呵，你们赶快给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听说要划那么块地方老定不下个名来，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这句话很重要！有了这个名就好办了。

那叫什么特区好呢？弄来弄去，先定了个名字叫“出口特区”。北京有另一类声音说：他不懂！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这话有道理。因为陕甘宁确实是政治特区。我们从这里得到启发，那就叫经济特区吧。用经济特区这个名字，应该说是摸到了一块大石头！这个名字很好，名字一出来，反对的声音好像也少了些。

当年9月，谷牧同志来广东。当时，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分管特区工作。他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了，你们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本来，在省委分工中我就是分管特区工作的，由于中央强调“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省委决定由我担任广东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

筹划办特区，得有一个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否则，就无法可依，无规可循。我们不能在试办特区问题上开国际玩笑。

1980年8月26日，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中国创办了经济特区。

最令人意外和欣喜的是，《条例》公布后，当时深圳最严重的问题——大量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十年后，新华社对外报道：中国特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史册中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记者：吴老，您筹划特区的第一件事，是研究、起草《特区条例》。而这个仅仅只有2000多字的条例从起草到公布，却用了一年的时间，前后作过13个草案文本，可谓是字字推敲。当初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在特区还只是个“概念”的情况下，率先着手拟定《特区条例》的呢？

吴南生：当时海外的朋友说，你中国是没有法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这样，从1979年开始，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研究、探讨外面先进的东西。因为过去我们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不了解，你光把人家的东西拿来抄是不行的，有很多东西你看都看不懂。他说房地产，我们根本不知道房地产是怎么一回事！外面的很多名词，我们都搞不清楚。比如说地租。我们是打倒地主的，一听到地租，都反对，可它在外面很普通。外面的东西要拿来研究、

讨论，哪些我们立刻能用，哪些是改进后才能用的。地租不行，就换个称呼，叫土地使用费，这也算是发明，现在大家都认可了。还有像工厂管理条例，我现在连个工厂都没有，你管它什么呢？可以说《特区条例》是借助了外边的材料，不停地研究、商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地改。这个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最早、最突出的例子了。

我跟谷牧同志讲，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区法、《特区条例》。这个法一定要拿到全国人大去通过。也找了叶帅，叶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说叶帅呵，这样一件大事，不能没有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

真的，这的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

尽管有一些同志不同意把《特区条例》拿到人大讨论，说从来没有一个地方的《条例》拿到全国人大来讨论的。我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呵！虽然叫作广东《特区条例》，但它是中国的特区嘛。社会主义搞特区也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这个《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通过，我说我不敢办特区。

后来，叶帅亲自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江泽民同志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订《特区条例》的说明。

“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这种尝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构想，可谓是大破大立，展示了一种智慧、胆略和冒险精神。

有人问：特区这么搞行不行？除了天上飘着的是五星红旗以外，地上搞的都是资本主义那一套！

小平同志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记者：创办特区，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书本上没有的，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照搬。吴老，您是如何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的呢？

吴南生：尽可能地解放思想吧，尽可能地多学习一些先进的东西。因为有时我们觉得很开放了，外边的朋友看了却说，你这一点都不开放。门关得久了，思想距离是很远的！

我给你讲个笑话。我刚到深圳时，要求男青年一律不准留长发。那时候深圳农民戴个太阳镜，穿着花衣服、牛仔裤在田里驶牛，许多从内地去的人都看不顺眼。我就说统统剪了。但是行不通。后来，我的儿子小南说，爸爸，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马克思、恩格斯也是长头发呵。我…想，是呵，共产党的老祖宗也是长头发，留长发怎么能说是思想意识问题呢？你看，我也闹过这样一个笑话嘛！

我们办特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特区要闯出一条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子。说白了，就是要改掉那种苏联模式的、自以为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路子。从1980年下半年起，这已成为特区实际工作中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我们在1980年底明确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这是对党中央提出的“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也非这样做不可。

1981年5月10日，我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一份报告现在可以公开了吧？）。其中说到，特区是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和管理下，以引进外资为主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特殊经济区域。我们要利用特区的特殊条件，一、观察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从中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二、试验各种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三、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目前，由于各种体制尚未进行改革，具体法规没有制订，特区实际上还处于打基

础的阶段，碰到的困难和问题还不少。特区的一切政策措施，一定要在“特”字上做文章。

现在回过头看，特区最大的功劳就是突破，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了。应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特区开始的。最先从深圳开始，到珠江三角洲，到全国。我说市场经济是个没腿的巨人，他走到哪里，谁都顶不住的。

特区改革，几乎每走一步，都遇到阻力，先是姓“社”姓“资”，继而由“反对和平演变”引发出坚持“一个中心”还是“两个中心”的争论。

特区会不会成为新的“租界”和“殖民地”？

如何反思与总结 20 年间的得与失，成为确保改革取得更大成功的关键。

记者：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有两句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可以说是特区建设曲曲折折历史的写照。吴老，你棋着“先手”，大胆办特区的构想与当时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和国家经济体制格格不入。您就没有一点顾虑吗？

吴南生：当时全国都在关注特区，都在议论特区。同时，全国也都在要求允许多一点“市场调节”，希望经济体制能进一步改革。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矛盾尖锐极了。

1982 年的 1 月，冷空气大量南下了一——

什么“上海租界的由来”，什么“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什么“特区不是社会主义”！没完没了，铺天盖地……这些都不去说它，只讲与计划经济有关的问题。

这年 4 月 22 日至 5 月 5 日，在北京有一次专门为广东深圳而召开的会议上，有人说：“……我认为深圳搞这么大的规划是不现实的。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深圳特区面积 327 平方公

里，比全世界的特区的总面积还要大，这么大的一块特区面积，全面搞起来不是简单的事情。”

我这里给你说的都是讲话的原件，有的问题说得很尖锐，很离谱，象这段：“特别要指出的是，有人想要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我认为搞计划经济是客观需要，不是你那一位领导想怎么搞就可以怎么搞的。你想‘脱钩’是不可能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美国、法国都认为要搞计划经济（这就是个常识问题了，他那个计划跟你这个“计划”能是一回事吗？）我建议省计委，你们也建议省委，应该把特区计划管起来。不能讲特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有这么大的外资，宏观计划更应该加强嘛，银行管理也要加强指导嘛！因此，特区建设应该纳入计划，要加强特区计划管理……”

你看，“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这一决策，是党中央 1980 年在一个文件中定的，有人却说：“不能说特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照此论调，我们怎么能不犯下“有人想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的大罪呢？！

1983 年底，小平同志说，特区究竟办得怎样？我要亲自去看看。于是，1984 年春天，小平同志到了深圳，到了珠海。看到经济特区确实是办起来了，确实是闯出一条路子来了，老人家很高兴，为深圳、珠海题了字。回到北京后，他向中央提议，召开全国沿海 14 个开放城市会议。

4 月，中央在北京中南海召开全国沿海开放城市会议。会议最后一天，谷牧同志说：南生，你该发言了。我说，我就不说了吧。谷牧同志和特区来的几位同志都说，你一定要发言。于是，我发了言。在讲到 1979 年 4 月小平同志说的：“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时心潮

澎湃，抑制不住大声说：这，就是中国特区的由来！

关于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特区，很多人写了很多文章，我没有也不能一一读。我读过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写得好的。但有一点，许多文章都说不清楚特区所以能办成是由于什么？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贡献是什么？我想，特区之所以能够办成，是由于引进了市场经济。它对全国的贡献，也在于引进了市场经济。它的试验、实践，证明了小平同志“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精辟理论，是小平同志一再提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改革试验。

1981年后，我不再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许多人认为我从这时起不再管特区工作了。不是的。这时，我回到省委，仍然分管特区工作，直到1985年9月，我从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转到政协工作，才不再分管特区工作。

关于经济特区，当然还有许多可以谈的。就先谈到这里吧。

（原载12月1日《南方日报》）

注重效益 稳步发展

——汕头经济特区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刘 峰

汕头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于 1981 年底成立，1982 年 3 月特区基础设施工程动工兴建。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引导下，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坚持从汕头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努力探索一条投入较少、产出较多、效益较好的路子。至 1987 年底，累计完成基建投资 5.08 亿元，其中，国内投资 3.75 亿元，利用外资 1.33 亿元。1983 年特区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有 372 万元，到了 1987 年，已发展到 3.38 亿元；1984 年出口总值仅 449 万美元，到了 1987 年，已发展到 1.78 亿美元。从 1984 年起资金开始回收，至 1987 年底累计回收 2.1 亿元，占国内投资总额的 56.5%。

汕头经济特区的起步建设主要采取以下做法：

一、坚持“四个一片”的方针，量力而行搞好基本建设

汕头特区设置于汕头市东至东南面的海滨地带，面积为 52.6 平方公里，分为龙湖和广澳两个片区。建设初期，汕头特区的交

通、能源、电讯等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筹措也较为困难。因此，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做好整体规划的基础上量力而行，执行“开发一片、建设一片、投产一片、获益一片”的建设方针，分期分片进行开发建设。

汕头特区的建设首先从龙湖片区 1.6 平方公里开始，这里原来是一片荒沙丘，我们把这片土地划为 5 个小片区，规划到 1992 年开发建成。首期开发面积为 0.2 平方公里。在其基本建成、摆满、逐步发挥效益之后，再开发第二小片区 0.24 平方公里。接着再进入第三小片区 0.47 平方公里的开发建设。在开发建设龙湖工业区的同时，我们还逐步开发建设了与工业区相配套的港口码头区、农业水产区、金融商业区、旅游区、住宅区，并发动特区内的农村及企业自筹资金开辟了珠池、广澳、渔港等 6 个小加工区。至 1987 年，汕头特区已开发建设的面积达 3.65 平方公里。

在建设资金投向方面，我们一开始就坚持以生产性投资为主的原则，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加工业的建设。在已完成的 5.08 亿元的基建总投资中，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有 3.68 亿元，占总投资的 72.5%。其中用于设备投资的有 1.6 亿元，占总投资的 31.5%。6 年中，共建成道路总长 40 多公里，3000 至 5000 吨级集装箱和散装两用码头 1 座，连接省、市电网的 4 万千瓦变电站和 6400 千瓦变电站各 1 座，日供水 2 万吨的供水工程，与汕头市区 12000 门程控电话系统联网的特区 2000 门程控电话系统。同时，电传、传真等现代电讯设施也投入使用，大大改善了特区的交通、能源、通讯等方面的条件。特区的厂房建设也一直放在主要的位置来抓。在目前已竣工的 49.5 万平方米房屋中，厂房和仓库的面积达 27.9 万平方米，占 56.4%。

在确保重点的同时，我们还认真抓好服务于生产的配套设施

建设,从小到大,逐步配套,相应发展。如特区内商业网点的设置,初期多数是比较简易的临时性设施,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增加高层商业楼宇的建设。龙湖宾馆一开始也只有 52 间客房,随着来往客人的增加,1986 年才扩建为有 237 间客房的较为高档的宾馆。至 1987 年,特区内已建起了一批写字楼、商场、餐厅、游乐场、宾馆、招待所、客商公寓、职工宿舍等生活服务设施,从而形成了较为配套的投资环境。

我们认为,这种量力而行,分期分片开发,确保重点,抓好配套的做法,比较符合汕头特区的实际,是一条以比较少的建设资金来达到较快形成投资环境的目的的有效途径。

二、在改善“软件”方面下功夫,扬长避短抓好外资引进

在抓好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建设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在改善“软件”方面下功夫,以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1. 精简机构设置,强化服务观念

在特区行政机构的设置上,我们根据有利于外资引进的原则和对外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和探索,力求建立起“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至 1987 年,汕头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之下只设立 14 个行政局。这些局不少是综合性行政部门,如经济发展局统管了内经和外经工作,规划建设局统管了规划、设计、城建、环卫、三防等工作。这样的机构设置,有利于简化办事环节和审批程序。在行政局领导人员的配置上,我们严格控制线数,规定只设一正一副。对机关工作人员也严格挑选,控制编制,力求精干。

在精简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的基础上,我们还反复加强对机